

## 【论 文】

# 也论维吾尔与突厥、土耳其

潘志平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突厥部，在漠北草原来去匆匆，语言文化上有一定影响，但没形成现代族体（Ethnic），更没有“国族”（Nation）意义上的现代“突厥民族”。“突厥化”（отуречение），其实就是语言的突厥化，这是中亚史上的一文化现象，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些操突厥语的诸民族。维吾尔的语言虽属语言上的操突厥语族，但它的先民回纥部与突厥部为敌二百年，与突厥部从不不是一个部族。突厥汗国境内的乌古斯部西迁的一小支入小亚细亚，长期与当地土著相融而成土耳其人，现代的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虽同属操突厥语族，但它们在历史和血统渊源上风马牛不相及。“东突”分子鼓噪泛突厥主义，说维吾尔是突厥族，甚至是土耳其族，把新疆说成是“东突厥斯坦”，甚至是“东土耳其斯坦”，就是企图虚构一个“突厥民族（Nation）”，建“东突厥斯坦国”，甚至“大土耳其斯坦国”，以达到将新疆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突厥、维吾尔、土耳其等问题，让“东突”分子搅得如此混乱不堪，须正本清源，清除其影响。

我们都知道，泛突厥主义是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思想源泉，当前还应认真考虑的是，泛突厥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到底有哪些具体表现？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维吾尔知识社会里有一些极其错误的认识，长期以来时隐时现，比如，维吾尔是突厥族！维吾尔与土耳其是同根同源一家人！新疆真实名称是“东突厥斯坦”！彻底清理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重要任务。中央民大教授杨圣敏先生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sup>1</sup>，本文就在杨圣敏教授工作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

### 一、所谓的“突厥民族”“突厥化”和“突厥人”

要讲清维吾尔与突厥的关系，除了明晰相关的史实外，还须厘清所谓的“突厥民族”“突厥化”和“突厥人”这些被弄得十分混乱的概念。

#### 只有古突厥部，并没有现代的“突厥民族”

突厥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最初只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的部落，有十姓，而以阿史那氏最为显赫。它作为“锻奴”曾为柔然部所控。公元552年突厥阿史那氏土门击败柔然自立为伊利可汗，突厥部从此崛起，它东灭柔然，西灭嚧哒，建有突厥汗国。极盛之时，所控东起辽海、西至西海（里海）、北抵北海（贝加尔湖）、南至漠北，但不久便分裂为东西两大块，史称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后来又又有后突厥汗国。所谓突厥诸“汗国”，只是庞大一时的部落联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八世纪中叶，突厥可汗后裔就不见诸史籍，而古突厥部就从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没有形成现代“族体”。<sup>2</sup>

这就是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上曾有过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突厥，总有人泛泛地将它称为“民族”<sup>3</sup>，但它绝不是 nation。nation 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斯大林有认真的回答，这

<sup>1</sup> 杨圣敏：《历史上维吾尔族与突厥及土耳其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sup>2</sup> 这里指的是具有历史和血缘意义上的“族体”（Ethnic）或“族群”（ethnic group），如汉族、维吾尔族等。

<sup>3</sup> “民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见词，在中文语境，“民族”是有着丰富涵义的术语，它既可谓“中华民族”，也可谓汉、藏、蒙、维吾尔等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族体，还可谓滞于封建甚至更早期的族体；甚至也有将历史上的早已消失的部族，如匈奴、柔然、嚧哒、突厥、契丹等称之为民族，但这是有问题的。其实在外文中有 nation、nationality、ethnos、people、narodnasti、ethnic、ethnic group 等，常在某种场合下译成汉文的“民族”，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即斯大林关于 *нация* 的定义（俄语中的 *нация* 大体相当英语中的 *nation*）。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关于 *нация* 定义排除了“血缘”联系，非常重要，正如宁骚先生指出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血缘联系排除在民族特征之外，是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大进展”<sup>1</sup>。据此，可以认为，斯大林关于 *нация* 的定义，非族裔性并明显带有政治实体的含义，表达的是现代政治范畴的“国族”<sup>2</sup>之意，即体现出民族和国家的两面。实践中 *nation* 有时对译为“民族”<sup>3</sup>，有时又对译为“国家”<sup>4</sup>。斯大林定义言之凿凿地强调：它“是一个在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sup>5</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就是“中华 *nation*”。而中国史上的突厥，是部落、部落联盟，并不具有任何现代“国族”意义上的 *nation*。一般说“突厥民族”，大多属认识上的模糊，但如果强调突厥之“民族”为“突厥 *nation*”，即“突厥国族”，那就别有用心。

### 所谓的“突厥化”，其实就是突厥语化

突厥部曾一度称雄于亚洲北部大草原，虽来去匆匆，但它在语言上有较大影响，表现在中亚文化史就有个突厥化现象。在突厥部消失三百年后的 11 世纪，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uhammed Kashgari, 1029-1126）著有闻名遐迩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就明确地说：原分布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粟特人（*soq̄d*）一部的索格达克人（*soq̄dak*）迁居到巴拉萨衮（*Balasagun*），“已经突厥化了”<sup>6</sup>。

“突厥化”是中亚史上一历史文化现象。值得关注的是，非常有名的突厥史大家薛宗正先生和中亚史大家王治来先生关于“突厥化”有专论<sup>7</sup>，并为突厥化起始时间有争议。薛宗正先生认为唐平定西突厥之前，西域就开始了突厥化，他在专著中写道：

西突厥汗国极盛时代，广大西域尽入版图，西域诸国尽为其藩属。这些藩国不仅必须称奴纳贡，而且还必须接受西突厥汗庭派来的吐屯监国，派遣军队进驻，而吐屯多乃世袭，逐渐取代了原来各地国王的地位。随着各国王统的变易，突厥语、突厥风俗先在各国王庭流行，后进一步向民间扩散，从而开始了西域突厥化的历史进程。<sup>8</sup>

王治来先生则以为薛说（唐平定西突厥之前）为时过早，他是这样论述的：

中亚和今新疆地区当时即使有大量突厥人迁入，但还不能算突厥化。我这里所说的突厥化，是指突厥人与当地原有的操东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就一要突厥人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突厥

---

“民族”的如此多义也时常引出问题。

<sup>1</sup>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7

<sup>2</sup> 苏联学者列舍托夫曾指出：“中文中的‘国族’，把‘国’（国家）和‘族’（民族）这两个词的含义再好不过地结合为一体，以表示国家范围内各民族的统一。为了表示这种统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为恰当的术语。众所周知，在其它语言中，包括俄语中，都没有这样的术语，尽管至今仍迫切感到有这种需要”。А.М.Решетов: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понятия “Чжунхуа миизу”*（论“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中译文（译者：贺国安）见《民族译丛》1992年第4期，第8-10页。

<sup>3</sup> 如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

<sup>4</sup> 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说：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e continent a new nation~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nation*）。

<sup>5</sup>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4。

<sup>6</sup> 这本书的维吾尔文本“突厥化”表述为：تۈركلەشيب [turkleʃip]，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译本）第1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615。

<sup>7</sup> 除薛宗正、王治来外，“突厥化”这一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如新疆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谷苞先生《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中央民大教授耿世民先生《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伟洲先生《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都有广泛使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一册，第197页上也有表述。

<sup>8</sup>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22~323。



人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才能使突厥人与当地人混杂地住在一个地方，便于通婚；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穆斯林妇女决不可能嫁给异教徒，故只有改信伊斯兰教才会促进通婚和混血。<sup>1[5]</sup>

王治来先生在讨论中专门给出注释特别表示：“薛宗正在研究突厥史方面很有成就，我很敬重他。他在《突厥史》第六章专设一节讲西域的突厥化，其中收集的材料很多。我与他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学术观点虽不同，话却说得很客气，此后也未见薛先生正式回应。笔者曾经为此请教薛宗正先生，先生的答复：突厥化，准确地说是“突厥语化”。我以为这一看法非常精到。

薛宗正先生与王治来先生关于“突厥化”争议表现在认定其的时间早晚，实际上是对“突厥化”概念的理解不同。薛先生说的是语言“突厥化”，即“突厥语化”，王先生说的是从语言到宗教、血液相融的“突厥化”。两先生之争议出在概念上的不同一律。

“突厥化”说得最多的是苏俄中亚史大家巴托尔德（Бартольд В.В.）。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一书一再谈及这一问题。现该书汉文译本作“突厥化”，是从德文本“Türkisierung”译过来的，是否准确地表达了巴托尔德的原意，还要看俄文本原文。该书使用这一概念多达几十余处，兹举〈第八讲〉开篇关于花刺子模突厥化的经典述说：

在草原突厥化之后，花刺子模所受的突厥因素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在伊斯兰最初的几百年间，花刺子模人们说的是为其他伊朗人所不懂的伊朗方言，但是，这种语言，不仅是日常用语，而且在11世纪人们还用来写书，……到了蒙古入侵时代的13世纪，花刺子模已被视为专用突厥语的国家。突厥化的过程显然是在11至13世纪之间实现的……

这段话的原文是：

После **отуречения** степи Хорезм больше других областей подвергался влиянию турецкого элемента. В первые века ислама в Хорезме говорили на иранском наречии, хотя и непонятном для прочих иранцев; на этом языке не только говорили, но и писали еще в XIв.; ..... XIIIв.;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о Хорезме уже говорится как о стране по языку совершенно турецкой. Процесс **отуречения** совершилс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между XI и XIIIвв., .....<sup>2</sup>

请注意，巴托尔德在这里从头至尾讲的是“语言”（язык）的演变，使用的 отуречение。当代一般俄文辞典和俄文引擎 Яндекс，已检索不到 отуречение，可能已没什么人使用它了，从其构成和巴托尔德使用的上下文看，它确切含义应是“突厥语化”。目前，Yandex 能检索到俄文维基百科 тюркизация 词条和与 отуречивание 相关内容的报道。前者与英语、德语的“突厥化”——Turkification、Türkisierung，同一；后者似乎类似于巴托尔德所谓的 отуречение（突厥语化）。所谓的“отуречение”，其实就是“突厥语化”，而不是种族血液上的融合。

### 所谓的“突厥人”——讲突厥语的人们

辽阔的亚欧草原上，由于游牧诸部始终处于大范围的流动，其结果是形成语言同质或趋近。而在突厥部称雄北部大草原之时，南部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便将草原上讲得突厥语与突厥部几乎一样的人们统称“突厥人”，即“讲突厥语言的人们”。正如巴托尔德再三强调的：“我们今天称说一种‘突厥’语的人们为突厥人”，“给突厥一字赋予语言学上的意义，即它现在所具有的，可能是穆斯林的著作。”<sup>3</sup>

<sup>1</sup>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4）。

<sup>2</sup> Бартольд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Т.V.[M]，Москва，Вост.лит.2002：116.

<sup>3</sup>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本表述为：“给突厥一字赋予语言学上的意义，即它现在所具有的，也就是说作为整个突厥民族的集合名词，可能是伊斯兰教徒的著作”。但查俄文本原文为：Присвоение слову тюрк т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но имеет теперь, было по-видимому делом мусульман (Бартольд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Т.V., стр.40)，并无罗致平中译本中的“作为整个突厥民族的集合名词”这段话。



一般的文化理论认为，“总是文明程度较高的部族，同化文明程度较低的部族”<sup>1</sup>。这还真是个问题，即文明程度较低的讲突厥语的“突厥人”，不仅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且最终在语言上同化了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绿洲定居民。尔后的伊斯兰化，也未能将中亚穆斯林阿拉伯语化？这一现象有点怪。我们试图做如下解释。

第一，语言当然属于文化范畴，就听说而言，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第二，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但有强弱势之差，说的人越多、越开放，就越强势。北方草原横亘万里，操突厥语的游牧人在其间逐水草而行，交流频繁、语言开放，其语言越显强势；而绿洲分散、孤立、封闭，各个绿洲上所诉说的方言，也只有在自己小小的绿洲上才能有对话者，随着大量“突厥人”南下在绿洲定居下来，绿洲上的弱势语言终究被边缘化，也就不奇怪了。正如巴托尔德所强调的：“如果突厥人和波斯人同住一个村子里，那么突厥语就逐渐地成为当地居民的共同语言”。<sup>2</sup>

第三，阿拉伯语，作为伊斯兰教的语言，作为阿拉伯征服者的语言，在中亚伊斯兰进程中有广泛传播。一千多年前，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他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的序言中说道：“突厥语同阿拉伯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马”<sup>3</sup>。他所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是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并非偶然。毋庸置疑，阿拉伯语文在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阿訇、毛拉不得不懂阿拉伯文，但百姓、农夫则是另一回事，除了波斯语、突厥语与阿拉伯语差别过大外，还有伊兰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冲撞。波斯人以泱泱波斯古国及悠久文明而自豪，面对阿拉伯语借宗教和行政力量的强势推进，刺激了达里波斯语的兴起，始于河中和呼罗珊地区，自东向西发展，并开始从口语上升为文学语达里波斯语。这就是巴托尔德所谓的“突厥斯坦<sup>4</sup>的波斯化”，即“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时代大大地加强了……中亚的伊朗方言逐渐为波斯语所排斥，形成了为伊朗和中亚的伊朗人所共同的一种波斯文学的语言”<sup>5</sup>。尔后的发展如巴托尔德特别指出的，1353年，金帐汗国一位出身花刺子模的诗人使用“察合台”文学语言写作<sup>6</sup>。“察合台”书面文，是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书写突厥语的文学语言，它还深受阿拉伯、波斯语法、词汇的影响<sup>7</sup>。16世纪中亚和新疆出了两部重要著作《巴布尔回忆录》（*Babur Nama*）《拉什德史》（*Tarikh-i-Rashidi*）。前者是帖木耳王朝末代王子、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创建者巴布尔大帝（*Zahir Babur, 1483-1530*），他的书是用察合台文写成的。后者是蒙兀尔贵族巴布尔的嫡亲姨表弟米尔咱·海达儿（*Mirza Haidar, 1499-1551*），他的书是用波斯文写成的。语言史家发现，1505年巴布尔大帝率领攻入印度的大军，说着突厥语，用阿拉伯语祈祷，却以波斯文书写。<sup>8</sup>总之，阿拉伯语化终究未能逾越横亘其中的操波斯语地区，更未及操突厥语地区。中亚大部分地方“突厥语化”，尽管其居民大多皈依伊斯兰教，语言深受影响，但却未阿拉伯化，也是基本事实。

## 二、突厥语化的结果是什么？

突厥语化的结果是，它们无论如何混血，最终并未融出种族或民族的“突厥”，更没有搞出现代的“突厥民族”，而一些操突厥语言的现代民族，在语言学范畴上属突厥语族。

<sup>1</sup> 钟兴麒：《中亚突厥化命题的由来》，《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5。

<sup>2</sup> Бартольд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Т. V., Москва, Вост. лит., 2002: 48.

<sup>3</sup>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汉文译本）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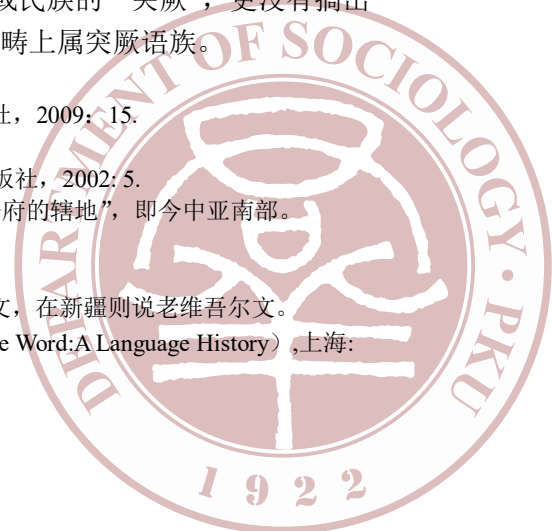
<sup>4</sup> 巴托尔德这里所谓的“突厥斯坦”，大体指的是旧俄统治的“突厥斯坦总督府的辖地”，即今中亚南部。

<sup>5</sup> Бартольд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Т. V., Москва, Вост. лит., 2002: 48.

<sup>6</sup> Бартольд В.В. *Сочинение*. Т. V., Москва, Вост. лит., 2002: 120.

<sup>7</sup> 这种文学语言因流行于“察合台汗国”地面而名，在中亚还被称老乌兹别克文，在新疆则说老维吾尔文。

<sup>8</sup>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著，章璐等译。《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Empires of the Word: A Language History*），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9, 195。



在这里必须弄清楚，“语族”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和“国族”属不同范畴的概念。

首先将不厌其烦地强调，“国族”（nation）意味着与全新的现代国家相联系，它是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下全体“国民”，在这里“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如同钱币的正反面，是一体的，在这个意义上，Nation 就是“国族”，而不是血缘文化相联系的族裔。

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大体属社会历史范畴，它可以这样概括：“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sup>1</sup> 强调种种民族性特征，终究将其内涵止于“族裔”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因此，有同志建议将 56 个民族称为“族群”，虽然对此有许多非议，但它们的“族裔”特性是鲜明的。

语族（language group），属于语言学范畴。现今全世界现存的语言接近 7000 种，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归类的方法，即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和关联，将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语族和语支。就语系而言，主要有汉藏、印欧、闪、阿尔泰、尼罗-撒哈拉、达罗毗荼、玛雅等十几个大语系。其中阿尔泰语系下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Turkic Language branch）下又有不同的分类法，大体上有：东部语支（包括有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西部语支（包括有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鞑靼语等）、北部（图瓦语等）和南部语支（包括有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等）。这就是语言学上的分类，它与一般民族，即“族裔”性族群无关，与“国族”（nation）也没任何联系。

至于语言学家为什么以突厥命名一个语族呢？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如前所述，历史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将草原上“讲与突厥部大体一样语言的人”泛称“突厥人”。二是古突厥部与其它更早的古部族相比，它有自己的文字，其古突厥文碑铭遗留在大草原上，随着古突厥部的衰亡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那些古突厥文失传，其所表达的历史整个地被遗忘。直至近代，西方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重新解读那些千年碑铭上的古突厥文，从而“再发现”了古突厥的历史文化，也就有将与之有关的语言归属于一个“突厥语族”的事。

总而言之，中亚突厥化，归根结底还只是语言的“突厥化”，语言突厥化只造就了一个个操突厥语言的现代族体：哈萨克、乌兹别克（乌孜别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土库曼、维吾尔、鞑靼（塔塔尔）、阿塞拜疆等。有人若借“突厥化”宣扬泛突厥主义，臆造现代的“突厥民族”，那也是徒劳的。

### 三、维吾尔不是所谓的“突厥民族”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不同部族、族群的迁徙交融的结果，在民族构成上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状况。维吾尔的先民袁纥、回纥、回鹘，原游牧在漠北，即今天的蒙古高原。突厥与回纥是不同的两个古代部族，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分属于东西两个丁零人集团。如果她与突厥发生关系，也就是曾深受其奴役，突厥汗国统治的回纥部落与突厥政权为敌近二百年<sup>2</sup>。突厥衰亡后，回鹘部领有漠北，与当时的中央王朝唐王朝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安史之乱”时还应唐王朝之邀出兵协同平叛。840 年，回鹘汗国破亡，回鹘一支南迁新疆，后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塔里木-吐鲁番盆地人口最多的族体，元代称畏兀儿。袁纥、回纥、回鹘、畏兀儿，都是 ئۇيغۇر ~ Uyghur 的不同时期的汉译，还要指出的是：袁纥、回纥、回鹘、畏兀儿等可为现代维吾尔族的先民，但并不可完全等同。

清代，维吾尔人被称“回人”，或“缠回”，民国时期又有自称“威武尔”之说。“缠回”有

<sup>1</sup> 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9。

<sup>2</sup> 杨圣敏：《历史上维吾尔族与突厥及土耳其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6(3):(17)。



对其不敬之谓，而“威武尔”则有自大威吓之意，都不是好的名称。

其实，近世以来，维吾尔各地人均以各绿洲城称，如：**قەشقەرلىق**（喀什人）、**ئاقسۇلۇك**（阿克苏人）、**كۆچلىق**（库车人）、**يەركەنتلىك**（莎车人）、**خوتەنلىك**（和田人）、**تۇرپانلىق**（吐鲁番人）等。而伊犁维吾尔人是准噶尔时期由南疆迁移过来的种地农民，因此为“塔兰奇人”（**تارانچى**），即蒙古语“种地人”。除维吾尔外，新疆还有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乌孜别克、塔吉克等十几个民族。

1920年代，“双泛”随着扎吉德教育传入新疆，第一批“东突”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开始鼓噪说，新疆同胞是“突厥族”，并于1933年在喀什搞了个短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民族名称的政治化，不仅破坏民族团结，而且直接危害地方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有鉴于此，新疆省政府1934年正式下文改“缠回”“威武尔”为“维吾尔”，寓意为“维护我和你”的友好关系，并在1935年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上正式识别出新疆14个民族：维吾尔、汉、蒙古、回、满、哈萨克、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兰其、归化等14个民族。这是当时新疆省政府仿照苏联进行的民族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大体接受了当年新疆省政府的民族识别，只做微调，即确定：“索伦”和“归化”分别改称“达斡尔”和“俄罗斯”，而“塔兰其”为伊犁维吾尔人，不再单独为一民族，这就是新疆13个民族的由来。<sup>1</sup>

1935年新疆的民族识别之积极意义在于，完全破除了“东突”分子的“大突厥族”的不法要求，必然引起“东突”分子仇视。1940年代，老牌“东突”分子艾沙、伊敏和麦斯武德<sup>2</sup>三人，攻击14个民族说，疯狂地鼓吹“维吾尔突厥族论”“维吾尔族土耳其族论”。艾沙为主席的“旅京新疆同乡会”在1944年10月13日《大公报》上刊出向国民政府的《意见》，《意见》要求：将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一律称为“突厥人”。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sup>3</sup>立即于次日的《中央日报》上发文，全面批驳《意见》。伊敏随即跳出来与黎东方辩论。由此，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展开所谓新疆突厥民族的大论战：

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吗？》（1944年10月14日）；

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1944年10月31日）；

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不应称为突厥斯坦》（1944年11月3日）；

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1944年11月24日）。

麦斯武德则在艾沙主办的《阿尔泰月刊》发文认为，新疆被“强分十四个民族”是不对的，其结论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子、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6个部落及塔吉克人为一个

<sup>1</sup> 王栓乾：《走向21世纪的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44。

<sup>2</sup> 艾沙，全名艾沙·玉素甫·阿勒甫金（Isa Yusuf Alptekin, 1901~1995）早年因习汉文，在英吉沙县衙门任通事，后随县长赴安集延领事馆任外交官，在乌兹别克斯坦接受了“双泛”思想。长期追随国民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进行分裂活动，曾出任过国民政府新疆省秘书长。新疆解放前夕出逃境外，辗转至土耳其，坚持分裂活动至死。伊敏，全名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ammad Amin Bughra, 1900~1965）早年在和田建立了“民族革命组织”（*Milliy Inkiab Taxkilati*）。1933年2月伊敏在墨玉发动暴动，成立和阗伊斯兰政府，自称帕夏，即“和田王”。1933年11月与泛突厥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Young Kashgar Party*）联手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事败后逃往英属印度克什米尔、阿富汗等地，寻求日本对其独立活动的支持，1942年被英印当局以日本间谍罪逮捕。在艾沙周旋和蒋介石的干预下获释，接到重庆与麦斯武德、艾沙汇合。曾出任过国民政府新疆省副主席。新疆解放前夕出逃境外，辗转至土耳其，坚持分裂活动至死。麦斯武德，全名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 1887-1950年），早年赴土耳其获得哲学和医学双学位，土耳其求学期间接受了泛突厥思想，归国后在伊犁办学校为掩护，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1935年辗转国外后赴南京，通过艾沙投靠国民政府，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进行分裂活动。曾出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新疆解放后死于家中。

<sup>3</sup> 黎东方（1907~1998），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民族——突厥族或土耳其族<sup>1</sup>。这是以学术研究<sup>2</sup>为名，公开鼓吹泛突厥主义，试图政治上构建一个“突厥民族”的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 四、维吾尔与土耳其人风马牛不相及

还请注意的，这些“东突”分子还蓄意将维吾尔族说成是“土耳其族”，更是胡言乱语。土耳其地处欧亚交界的小亚细亚，在古代处于东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早期先民是地中海原始居民，即东罗马帝国遗民与拜占廷希腊人混血。12世纪后乌古斯部奥斯曼人迁入，特别是奥斯曼一世在1299年建立奥斯曼帝国，有着东西方血统交融的土耳其人逐渐成型。乌古斯部来自突厥汗国势力范围内的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盟，11世纪入呼罗珊地区建有塞尔柱王朝，它应是今天土库曼人的先民。进入土耳其奥斯曼部只是乌古斯的一小部落，对当地最大影响是小亚细亚地区的语言突厥化，即今天的土耳其人操的是突厥语言。历史表明，维吾尔人不是突厥部的后裔，维吾尔先民回纥部与九姓乌古斯、乌古斯、奥斯曼没有任何关系，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除了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又各属不同语支）之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联系。<sup>3</sup>实际上，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语言、对话也并不相通。回顾历史，从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人口与种族特征以及语言特征，古突厥部与当代突厥语族语言各民族的关系，可以说，讲突厥语的诸多民族跟历史上的古突厥部并无必然联系，语言学上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民族学上的民族。但在泛突厥主义思潮的蛊惑下，某些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借口语言上的亲缘性，混淆语族和民族的概念，这是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典型错误的民族观。

泛突厥主义者编造“维吾尔族突厥论”“维吾尔土耳其族论”，毫无历史根据，但这些错误言论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在不大懂历史的普通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依然有不良的影响。而一些历史问题如此之复杂，甚至内地教授中也有糊涂的认识<sup>4</sup>。这是我们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中面对的严肃问题。

#### 五、新疆不是“东突厥斯坦”，更不是“东土耳其斯坦”

“东突”分子一口咬定：“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艾沙1934年主持“旅京新疆同乡会”（对内则为“旅京东突厥斯坦同乡会”），特别规定入会必要条件是：“敢于提出取消‘新疆’而采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的要求，愿意为东突厥斯坦自由而斗争”。伊敏1940年流亡英属克什米尔时，撰写分裂主义之作《东突厥斯坦史》，鼓吹：“东突厥斯坦革命没有结束，不独立，革命就不会结束”<sup>5</sup>。

历史不容胡编。新疆古称“西域”，中国近二千年以来的文献就是这样记载的。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及和卓叛乱之时，清朝官方文书中开始出现“新疆”这个概念。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御制《开惑论》曰：“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旧志，辟新疆”<sup>6</sup>，这或许是“新疆”之名较

<sup>1</sup> 麦斯武德：《介绍新疆民族》，《阿尔泰月刊》创刊号（1944年）。

<sup>2</sup> 除了将六个操突厥语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归成“突厥族”之外，还将完全不是操突厥语的塔吉克说成是“土耳其族”，在学术上毫无价值。

<sup>3</sup>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杨圣敏先生的研究：《历史上维吾尔族与突厥及土耳其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sup>4</sup> 有位名教授主编的《突厥人变迁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书声称反对东突，但在其书中竟然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乌兹别克人等族的历史，列入“突厥人”的“变迁史”，论述“突厥人如何演变成今天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及阿塞拜疆人等”。此项研究还在甘肃省获奖。

<sup>5</sup> 转自《21世纪》，2014年12月号，第70-71页。

<sup>6</sup>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条。



早而又最权威的提出。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的一份上谕肯定了“西域新疆”的说法<sup>1</sup>，即作为西域的一部分“新疆”，为直属中央的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区，列在甘肃省之后，增纂入《大清一统志》，确定了“新疆”的法律地位。道光元年（1821）成书的“钦定”《新疆识略》，又以图文规定了“新疆疆域”。19世纪60~70年代，外敌入侵，西北边疆发生空前危机。1878年清军彻底扫荡阿古柏。1882年，迫使俄军从所霸占的伊犁撤走。为此，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议中提出“他族逼迫，故土新归”的论点。光绪十年（1884），正式建“新疆省”，通行“新疆”之名，实有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纪念意义。作为祖国这块热土的新疆，此后就再也没更改其名<sup>2</sup>。

“东突厥斯坦”完全是外人输入的外来语。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提出“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的是，18世纪中叶，两位在北京供职的葡萄牙神甫在一份《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报告》中，将塔里木盆地称作“东突厥斯坦”<sup>3</sup>。俄人季姆科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sup>4</sup>1827年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报告》，提出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突厥斯坦”。其时，出任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修士大司祭俾的丘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提出：“在这里，若是把布哈拉突厥斯坦称作西突厥斯坦，把中国（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厥斯坦，那就更恰当些”。<sup>5</sup>

所谓“东突厥斯坦”不见于汉文史籍，也不见于新疆本地史籍。比如，出生于拜城的维吾尔大学者毛拉木萨，在1908年出版了一部史书《伊米德史》中<sup>6</sup>，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他认为自己的家园是蒙兀儿斯坦。塔城伊玛目库尔班外里·哈里迪可能是第一次听说“东突厥斯坦”这一概念的新疆本土学者。此人1910年在俄国喀山出版了一本书《东方全史》，书中引言中提到“东突厥斯坦”，但他说，“至于东突厥斯坦，不知在哪里，完全是听来的，不应再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消磨时间”。<sup>7</sup>有资料证明，直至1920年代初，维吾尔普通民众还没有听到过“东突厥斯坦”。一份批判维吾尔族国会议员的文件的维吾尔族作者自称“南疆人”，即新疆南部人。<sup>8</sup>

193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前后，在分裂分子鼓噪下，“东突厥斯坦”方才时髦起来。“东突厥斯坦”本是西方编撰的地理概念，经过“东突”分子的政治化处理就成为将新疆分裂出去的政治理念。他们不仅要新疆分裂出去，还要与中亚地区联合搞一个“大土耳其斯坦国”。艾沙主办《边铎》杂志就露骨地提出：“现在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和西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领袖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彼此确商，互相帮忙……，把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把土耳其斯坦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sup>9</sup>。

请注意，这些“东突”分子特意将“East Turkestan”对译作“东土耳其斯坦”，即不仅将维吾尔人称为“土耳其人”，还将新疆称作与土耳其遥相呼应的“东土耳其”，在普通不懂历史地理的维吾尔人中先验地虚构维吾尔与土耳其历史和地理的联系。其实，突厥与土耳其在国际学界那里已经分得很清楚。

中文	英文	俄文	德文	法文	土耳其文	日文
突厥	Turk	Тюрк	Türke	Turc	Türk	チュルク
突厥斯坦	Turkstan	Туркестан	Turkstan	Turkstan	Türkistan	トルキスタン
土耳其	Turkey	Турция	Türkei	Turquie	Türkiye	トルコ

<sup>1</sup>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条。

<sup>2</sup> 潘志平：《“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民族分裂的黑蠹》，《西域研究》2004(3)

<sup>3</sup> 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0.

<sup>4</sup>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20

<sup>5</sup> Литвинский Б. А. *Проблемы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рубежной науке.* — НАА. 1982, № 1.

<sup>6</sup> 《清代察合台文献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315-540.

<sup>7</sup> 库尔班外里·哈里迪：《东方五史》，喀山：(出版单位不详)，1910:2.

<sup>8</sup> 转自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28.

<sup>9</sup> （未署名）《东土耳其斯坦的前途》，《边铎》1934（2）：58.





苏联突厥语语言学大家捷尼舍夫（Э.Р. Тенишев, 1921~2004）早在 1950 年代就指出：“在汉语里很早就把‘突厥’与‘土耳其’区分开来。汉语汉字‘突厥’等同于 Тюрк，汉字‘土耳其’等同于 Турция，这种区别将来继续保持下去也是适当的”<sup>1</sup>。然而，受到“东突”影响，在实践中一直有将“突厥”与“土耳其”混用的错误，至 1980 年代仍有学者认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sup>2</sup>。而新疆学者卡得尔·艾克拜尔和热夏提·努拉赫迈德则引经据典证明了：East Turkestan “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并指出：“过去，由于汉文错误地将‘East Turkestan’一名译作‘东土耳其斯坦’，从而使人产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土耳其’之东部，或‘东土耳其’这样一种错误概念，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政治问题”<sup>3[26]</sup>。1990 年初，新疆社会科学院完成的重大课题“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完全排除了译名“东土耳其斯坦”的错误提法和认识上的糊涂。<sup>4</sup>其实，即便在土耳其学者那里，将土耳其（Türkiye）与东突厥斯坦（Doğu Türkistan）、西突厥斯坦（Bati Türkistan）区分开来，并没有将土耳其说成西土耳其斯坦。



### 简短的结论

“东突”分子鼓噪泛突厥主义，胡说维吾尔是突厥族，甚至是土耳其族，把新疆说成是“东突厥斯坦”，甚至是“东土耳其斯坦”，就是企图虚构一个“突厥民族（nation）”，建“东突厥斯坦国”甚至“大土耳其斯坦国”，以达到将新疆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突厥、维吾尔、土耳其等问题，让“东突”分子搅得如此混乱不堪，须正本清源：

一、历史上有过“突厥”为名的部族，但从来就没有形成所谓的现代“突厥民族”。

二、“突厥化”（отуречение），其实就是语言的突厥化，这是中亚史上的一文化现象，其结果是造就了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维吾尔、土耳其、阿塞拜疆、鞑靼等一些操突厥语的诸民族。

三、维吾尔的语言虽属语言上的操突厥语族，但它的先民回纥部与突厥部为敌二百年，与突

<sup>1</sup> 埃·捷尼舍夫著，陈鹏译：《突厥语言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此书源自作者 1950 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讲学的讲义。

<sup>2</sup> 张明德：《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中国翻译》1986(2)

<sup>3</sup> 卡得尔·艾克拜尔等：《“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民族译丛》1989(3):封三。

<sup>4</sup> 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389-390。



厥部从不不是一个部族。

四、突厥汗国境内的乌古斯部西迁的一支入小亚细亚，长期与当地土著相融而成土耳其人，现代的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虽同属操突厥语族，但它们在历史和血统渊源上毫不相干。

五、新疆古称西域，从来就不是“东突厥斯坦”，将“东突厥斯坦”对译成汉文的“东土耳其斯坦”，不是分裂主义的阴谋，就是认识上的糊涂。

## 【论 文】

### 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嬗变<sup>1</sup>

咎 涛<sup>2</sup>

**摘要：**从历史角度看，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关于库尔德人的认知基本处于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的框架内，并不突出库尔德人独特的民族身份；在凯末尔主义主导的时代，土耳其官方主要是从同化库尔德人的角度刻意抹杀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并将库尔德问题主要视为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在当代土耳其，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曾明确提出一种“新思维”，区分国族认同和族群身份，承认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民族的存在，试图与库尔德工人党和解，实现停火并解决国内安全问题。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和解进程已然搁浅，当下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的话语又回到了以国家安全议题优先的立场上。

**关键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话语；凯末尔；埃尔多安

#### 一、前 言

无论是从媒体呈现还是从个体观感的角度，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该国的核心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使近4万人丧生、耗费了土耳其巨大财政收入的重大政治问题。<sup>3</sup> 本文的落脚点不是讨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政治与历史过程，而是尝试初步且概括性地讨论自近代以来，也就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国家层面围绕所谓“库尔德问题”（Kürt sorunu）的话语（discourse）转变<sup>4</sup>。

<sup>1</sup> 本文刊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3-24页；原文发表时有删减，这一版本在原完整版基础上略有修订。

<sup>2</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sup>3</sup> 数据可参见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库尔德人是中东第四大族群，是一个典型的跨境民族，其对土耳其国家的威胁是最大的。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4, October 2002, p. 123.

<sup>4</sup> 就土耳其国家层面的“库尔德问题”话语研究来说，土耳其社会学家麦苏特·严教授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严教授将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话语置于宏大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反驳了一种陈规陋见，即土耳其有意识地“遮蔽”了库尔德认同。他从话语形成的角度提出，土耳其并不是在理性地、自主地实践着其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话语，毋宁说，土耳其是在一个从传统的马赛克化的、多元-普世主义的帝国向中央集权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蜕变过程中，在一个从落后的传统东方国家向一个西方化的、欲达到当代文明水平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在一个把分散的人口凝聚为一个同质化的人民的过程中，处理库尔德问题、发展出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话语的。也就是说，土耳其不是就库尔德问题而处理库尔德问题，库尔德

